

风俗画体现了宋代画院的开放

■张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花鸟画不仅代表了一种较高的文化修养情趣,而且也被作为宫廷、寺观建筑物的内部装饰。画院花鸟用黄派风格画出,既富丽辉煌,又典雅典趣。释道人物画大受重视与宋皇帝一开始就笃信宗教有关,许多较大型的官邸和寺庙的建造,都要绘制政教宣传画。

宋太宗时重修开封最大的寺院大相国寺之时,画院名家高益、高文进、王道真、李用及、李象坤都为之进行壁画创作。真宗时修建玉清昭应宫之时,画院画家领导从全国招募来的三千多画师进行大规模的壁画工作。

界画(主要用以描绘宫室、楼台、屋宇等作画时需用界尺引笔画成,故称界画)在宋代达到高峰,从社会原因上说,是与社会转型、市民兴起和对技术兴趣的高涨相联系的。但从艺术体制上说,却与画院的提倡相关。在《宣和画谱》中,界画排在画谱十门类的第三位,后于道释、人物,而前于山水、花鸟。

界画主要用来绘建筑物,产生很早,《汉书·郊祀志》记载有《黄帝明堂

图》就为界画。界画主要是画工之事。顾恺之说:“台榭(界画),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难成,因毛笔作画,横竖要画直,比例须不差,不容易,得用界尺引笔画成。正因此,它完全是靠一种结构之美,而不是笔墨之美,因此地位不高。但宋代的市民倾向于科技氛围,使界画闪现出一种特殊的魅力,从市民的眼光看,画得好不好一看就明白的,就是界画;从科技的观点看,界画最讲程序和规矩,最好用一个客观标准来衡量。

正是这一背景下,界画在宋代成了一门“显学”,被列入画院的入院考试科目,也是院内学生的必修课。《宣和画谱》说:“(界画)自晋宋迄于梁隋,未闻其工者,粤三百年之唐,历五代以还,仅得卫贤以画宫室得名。本朝郭忠恕出,视卫贤辈,其余不足数矣。”宋代界画名家除郭忠恕外,还有王士元、赵伯驹、赵伯骕、李嵩等。宋代界画讲究精工细密,计分寸,向背分明,不失绳墨,往往结合金碧山水,亦为人物画的背景。如赵伯驹兄弟就以擅长金碧山水、界画阁楼著

名。由于界画最倾向于技术性,也最容易比较,被有些人目为院体的代名。“取工细刻划,号为院体。”“后人从事界画,称为院体。”

邓椿也说:“画院界作最工。”西方文艺复兴是以绘画为代表的,而绘画是以科技为基础的,这与中国的界画在宋代成显学有相似之处,然而,西方油画却成为当时的最重要的示范学科,并自此以后成为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宋代界画虽然在画院中也形成了重视客观世界的谨细拟物画风,但中国文化的基

本精神一方面在画院里以重诗意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一面,以文人画的产生形成与界画精神的完全对立,因此界画终于未能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而这,正如宋代科技在古代的命运一样,以一种方式暗示了中国文化的转型性质。回到画类上来,山水画代表士人的修养趣味,风俗画、历史画与现实社会风气相连。这三类画,特别是风俗画,进入画院透出了宋代画院具有一种开放的性质。

(据《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题目为编辑后拟,原文有删减。)



■宋 苏汉臣 秋庭戏婴图 绢本

■ 藝思語 梵高临摹“浮世绘”具有创造性意义

■王镛(著名学者)

1884年法国作家龚古尔在小说《宝贝》的序言中提到:“日本主义”是19世纪欧洲最重要的美学运动之一。当时梵高在荷兰南部的小镇纽南父母家里,曾见过几幅日本版画,又读了龚古尔的小说,对日本艺术心向往之。

1885年11月底,梵高从纽南家乡出走,来到比利时北部的港市安特卫普。5月间安特卫普曾举办世界博览会,日本浮世绘版画十分畅销。梵高一到安特卫普就开始搜集浮世绘版画,他在写给弟弟巴黎画商特奥的信中说:“我的画室不错,尤其是由于我在墙上钉上了一批小幅的日本版画,我非常喜爱这些画;在

花园里或海滩上画得很小的妇女、骑马的人、花卉、多刺的枝条。”

1886年2月底,梵高从安特卫普来到巴黎,在接受印象派和点彩派绘画影响的同时,他对日本浮世绘版画的喜爱与日俱增。1887年春天,他与特奥多次造访巴黎画商西格弗里德·宾收藏着一万多幅日本版画的阁楼,以低价购买了约500幅日本版画。梵高在巴黎时期热衷于临摹日本版画。1887年7月至9月,梵高仿照日本版画原作临摹绘制了三幅油画:《花魁》《雨中大桥》和《开花的梅树》。《花魁》是日本浮世绘画家溪斋英泉(1790—1848)的版画,原来刊登于1886年5月《巴黎画刊》“日本”专号的封面。梵

高先用半透明的蜡纸拓下版画人物的轮廓,然后放大画成油画。

在用油彩着色过程中,梵高在画中日本艺伎四周增加了彩色边框,边框上画着丛生的竹子、睡莲绽放的池塘、鹤与蛙。法语“鹤”与“蛙”是“娼妓”的双关同义词,在这里可能暗示着花魁的职业。鹤是梵高根据佐藤的一幅版画临摹的。《雨中大桥》和《开花的梅树》都是临摹梵高自己收藏的安藤广重的木刻版画。《雨中大桥》临摹的是广重1857年所作的版画《江户名胜百景》之一《千住大桥夏日黄昏的骤雨》。

梵高的油画与广重的原作不同的是更加强调色彩的对比,他把版画中的蓝黑色调改变成油画中的黄绿色调,远山、

雨丝和波浪也掺杂了印象派的笔触,整个画面从冷清变为热烈,边框还装饰着从其他日本版画借用的书法。《开花的梅树》临摹广重的版画《江户名胜百景》之一《龟户梅屋铺》,梵高也是先用蜡纸拓下版画梅树的轮廓再放大画成油画,色彩对比同样比原作强烈,树枝的线条也更加刚劲。

梵高这些临摹日本版画的油画,基本保留了原作的平面化和装饰性效果,但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原作,而是部分改变了原作的结构和色彩,加进了印象派的笔触和自己强烈的色彩感觉,因此可以称之为创造性临摹。

(据《移植与变异——东西方艺术交流》,题目为编辑后拟,原文有删减。)

■ 故 鐘 欽 欽 湾区文化共融下 澳门艺术生态可期



■澳门科学馆 贝聿铭建筑作品

■梁志钦(资深媒体人)

在澳门岛上的科学馆建筑是出生于广州的国际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作品,而近年在氹仔岛平地而起的摩珀斯酒店,则出自女性建筑师扎哈·哈迪德之手,一定程度上,这两件作品,成为了澳门在经典建筑脉络上重要的两点。但有点遗憾的是,关心或者关注的人并不多。长期以来,人们对澳门的印象总等同了博彩和娱乐,也是因为这二者过于强大的光

环,其余的人文景观乃至历史文化总被掩盖着。

事实上,回顾中国近代美术史可知,早在400年前,西方传教士不但把西方油画带到澳门,而且引导了画家在这里开办教授西方绘画的机构。1614年,意大利画家乔瓦尼在澳门的圣保禄修院设立绘画学校,培养了自己的油画弟子,他的弟子们深入内地进行艺术活动对明代油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他们在各通商口岸建立了最早的油画传播机构,造就了中国最早的油画家。其中出生于澳门的游文辉便是他的学生之一,也是后来澳门有影响的西画家。最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去世前,曾请游文辉到京为他画像,现藏于梵蒂冈,是目前发现中国最早的一幅存世油画。

很长一段时间,澳门都担当着文化窗口或者跳板,甚至文化避风港的角色,1903年,高剑父转学澳门格致书院,学习西方素描。抗战时期,关山月先生到澳门,在岭南画派代表高剑父的教导下,进行了深入的绘画学习,并将高剑父收藏的古代

绘画和日本画的画册进行一一临摹,成为了关山月求艺生涯中重要的阶段。已故著名雕塑家潘鹤不但在澳门学习了水彩,更在澳门期间,得以让自己的雕塑上了另一个台阶。

新世纪之后,虽然不少当代艺术家在澳门开办个展或者群展,早已不是新鲜事,但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推出,这里不仅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同发展,离不开区域文化的融合。粤港澳三地应加强大湾区整体融合发展,提升大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打造开拓创新、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大湾区文化。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艺文荟澳·澳门国际艺术双年展2021”正式启动,为期四个月的大型国际文化艺术盛会活动覆盖全城的艺术网络,为市民及游客带来多元视觉艺术盛宴。在系列活动中,也可以看到著名艺术家蔡国强、广州美院美术馆总馆长王璜生等一众知名艺术代

表的作品身影。

而事实上,近年也早有不少广东的文化学者到澳门进行交流与讲学,包括广州美术学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广东省美术馆协会副会长罗一平、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谭亮等。

长期以来,澳门文化与广州乃至岭南各地,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更多地承载了外来文化与东方文化交汇的桥梁作用。

日前,有资本终于也开始垂爱这一桥梁作用,斥百万巨资作奖金,推动“明日可及——2021大湾区青年艺术家计划”绘画及摄影竞赛的举办,正如王英伟博士说,为了更好地让澳门文化融入大湾区的发展格局,通过这个活动,期望能吸引更多的大湾区青年艺术家关注澳门的人文面貌。

是的,目前社会各界均已嗅到相融与发展之风,在湾区文化共融的历史时期,澳门的艺术生态或将再次成为新的文化跳板。